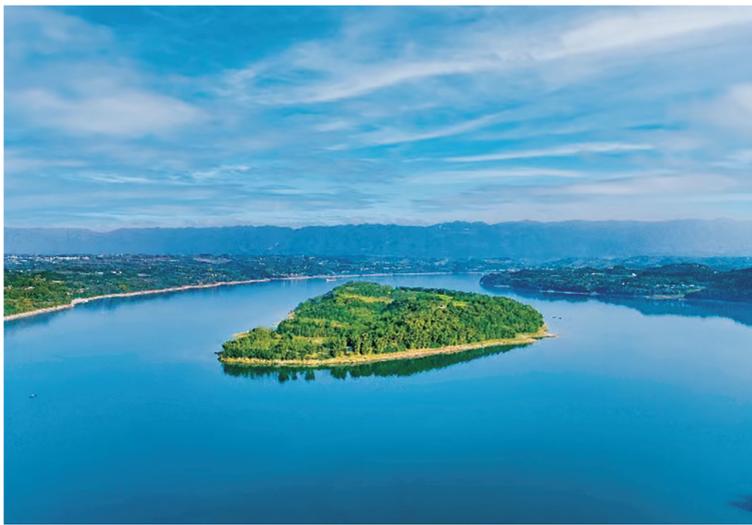


# 重庆市创建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 打造三峡文物保护利用综合示范样板



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

近年来,重庆市文物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峡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指示精神,强化考古、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整体性工作思路,着力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三峡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标识。围绕长江流域人类起源、巴文化、宋元山城遗址等重点方向,按照保护级别、保存状况、区位优势,创新“一园多点”建设模式,从三峡重庆库区541处考古遗址中遴选出万州天生城遗址、奉节白帝城遗址、云阳磐石城遗址、忠县皇华城遗址、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等5处三峡大遗址,落实投资约5亿元,创建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过半。目前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并于2023年9月27日对外开放,共接待游客4.5万人次。

## 坚持高位推动,强化规划引领

一是抓实规划驱动。2023年5月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政府、湖北省政府等7家部门和省市联合印发《三峡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明确以三峡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文物可持续保护利用机制,把文物保护利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为总体目标。《重庆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对标提出21项规划举措。二是创新工作机制。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三峡文物保护等工作纳入区县党委政府综

合考核重点内容和重点督办事项,建立“赛马比拼”工作机制。在建考古遗址公园设置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与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管所等共同参与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其中,忠县皇华城、两江新区多功城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过程中由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全程指导,建成后由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忠县通达投资公司、两江新区文化传媒集团等负责开放、管理、运营工作。三是落地项目立项。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正式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重点建设项目。2023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重庆召开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推进会,明确在2025年之前立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坚持资源导向,提供高效保障

一是摸清资源底数。全面完成重庆三峡历史文化资源“起底式”调查,形成《重庆市三峡库区历史文化资源调查报告》,进一步摸清历史文化资源底数,明晰文物保存现状,为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奠定基础。二是强化技术支撑。编制完成《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可行性研究》,配合中建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完成《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路径技术研究报告》。三是完善配套设施。2021年以来,在建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均公布或编制了文

物保护规划,规划总面积约243.6公顷。其中,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内拟规划建设重庆三峡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三峡重庆库区考古遗址工作成果。

## 坚持项目带动,积蓄发展后劲

一是文物保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针对性实施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利用项目近100项,遗址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重点实施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修缮及保护棚、万州天生城遗址本体保护及摩崖造像修缮、奉节白帝城遗址考古体验中心及考古工作站、云阳磐石城遗址城垣城墙及古民居修缮、忠县皇华城遗址保护设施、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环境整治、巫山龙骨坡遗址保护棚等一批三峡大遗址保护修缮和展示设施工程。二是文物修复项目稳步实施。加快实施《重庆三峡库区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完成2022年度三峡出土金属器、陶瓷器、纸质等文物修复2400余件(套),丰富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及三峡库区博物馆展陈。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为三峡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建成三峡数字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技术结合创意互动形式,辐射带动三峡库区大遗址保护能力全面升级。

## 坚持考古先行,发挥实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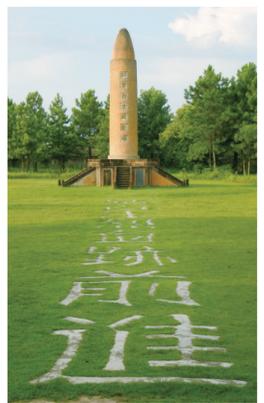
一是加强考古发掘。实施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万州天生城遗址、奉节白帝城遗址、云阳磐石城遗址、忠县皇华城遗址、两江新区多功城遗址、巫山龙骨坡遗址、巫山玉米洞遗址、丰都犀牛洞遗址、江津石佛寺遗址等三峡大遗址考古近20项,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土文物标本5000余件(套)。二是推进价值研究。大力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涪陵小田溪墓群、九龙坡冬笋坝遗址、江津梧桐土遗址等“考古中国”——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为三峡地区人类起源、巴文化、川渝宋元山城体系等与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考古实物资料。三是推动成果转化。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等29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推进44项三峡考古研究报告编写及出版工作,委托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实施《三峡文物与中华文明》《文创产业与特色旅游》《形象传播与园区建构》《机制创新与体制示范》4项课题研究,为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渝文)

# 江西瑞金: 中央苏区革命文物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廖九平 苏春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博物馆旧址(摄/杨芳英)



红军烈士纪念馆(摄/杨芳英)

以红都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诞生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开展了革命文物征集、保护、陈展工作,建立了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馆等革命纪念建筑,卓有成效的革命文物工作,为“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发挥了重要的教育、鼓舞和激励作用,为新中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了有益镜鉴。

## 中央革命博物馆的诞生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要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囑遗物作纪念品。虽然限于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这一决议案还未能考虑到建立革命博物馆来陈列和保存这些革命文物,但是收集、整理革命文物的设想已经开始萌生。

革命文物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是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召开期间,大会筹备委员会举办了红军战利品展览。这次展览虽然陈列品不多,但在苏区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便启动了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的构想。

在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开展后,为加快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建工作的步伐,1933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并将其设置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内,由该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之后为了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常态化,又将划入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局,由该局直接负责其建成之后的日常工作。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的决议,代表苏区文化建设成果的中央革命博物馆被“二苏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纳入大会的筹备项目之一,作为“二苏大会”的献礼工程。而这一决定也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迅速有序开展起来。

1934年1月,“二苏大会”召开期间,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诞生于瑞金,并在县城东郊正式对外开放,苏区军民踊跃前往参观,深受教育。

## 中央革命博物馆的文物征集

要把中央革命博物馆建设落到实处,需要解决好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为此,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布革命文物征集启事。

1933年5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刊登在《红色中华》第75期上。该启事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教育部成立革命博物馆的目的,即促进苏区文化教育,还告知了社会各界革命博物馆将暂时建在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的计划;另一方面还重点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包括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革命的各种物品,相片,旗帜、印章、徽章等类,私人的物品五大类。

此后,为了扩大革命文物的征集范围,时任中央区教育人民委员部秘书长、社会教育局局长阮山在1934年1月13日的《红色中华》上又发表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筹备中央革命博物馆》一文。文中将待征集的革命文物分为10类,包括:世界革命领袖照片及其事迹;中国土地革命历史的变迁;中华全国苏区发展形势图;牺牲烈士的遗像及其光荣事迹;牺牲烈士纪念馆;红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品;机关部队革命团体的纪念品;红军机关和地方武装所发明的与自制的军用品;苏区各地的特产品;苏维埃文化。这些革命文物的10个分类与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布置基本一致。

## 中央苏区的革命文物展陈

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召开期间,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举办了一次红军战利品展览,将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耀辉穿的黄呢军衣、军裤,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私人印章,以及部分



《红色中华》第八十九期刊登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

武器装备,陈列展出,供代表们参观。

1932年冬,中央土地部和中央教育部联合筹办中央农产品展览所,展出200多种农业优良品种和农产品,吸引了许多农民参观。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开始筹建模型室。这实际上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军事博物馆,分为“军事门”“政治门”“文化门”等门类。1933年4月30日,红校模型室正式开幕展出,吸引了众多军民参观。

令人想不到的是,红校模型室开幕后的参观,还实行了预约制。开幕前一周,以校长叶剑英和模型室建设委员会名义,在《红色中华》刊登启事称,模型室开幕之日,为各代表及红校各部队参观期;5月1日为各机关、各团体及各地工农武装参观期。参观证可向红校政治部索取。由于参观的人很踊跃(开幕当日有4000余人,次日更多达7000余人),以致红校所在地的群众(尤其是劳动妇女们),“对着那圆形的旋转门(又名纪律门),因为每一次只限一人出入。)惊奇发笑,同时他们心里不免又要恼恨,因为他们想立刻进去参观那许许多多新的东西,而这个‘纪律门’又偏偏要暂时阻止他们前进。”毫无疑问的,红校模型室是无产阶级的新创作,是苏维埃政权下一个伟大的建设。

## 中央苏区的革命纪念建筑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二苏大会”的决议。为此制定了《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工作计划》,成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关于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筹备工作中有一项重大内容,就是建立红军烈士纪念馆。7月15日,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委员会由主任梁柏台署名,发布建立红军烈士纪念馆的启事。启事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这些被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馆,责令本委员会负责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决定在瑞金叶坪附近建立这个纪念馆,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时举行纪念馆的揭幕典礼。为了进行纪念馆的建立有下列两件事要求于苏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红色战士和红军政治部机关:

(一)纪念馆应该是苏区广大群众和全体红色战士对于过去死难烈士的热烈敬仰情绪的结晶,因此纪念馆的建筑费除了中央政府拨出一部分外还须各地工农群众和红色战士自动的募捐来帮助。这个募捐不是单纯地看经费上而是要使广大群众知道建立这个纪念馆的意义。

(二)请红军各级政治部调查各次战役中所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姓名,并将他们的简单履历叙述出来寄送本委员会。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1日,在叶坪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红军烈士纪念馆等一组(纪念牺牲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红军军长黄公略的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献身的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的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馆和红军检阅台)革命纪念建筑的开工典礼。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纪念馆等革命纪念建筑均于1934年1月底竣工。红军烈士纪念馆矗立在叶坪红军广场中央,炮弹造型的塔身宛如一柱擎天,宣扬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塔身镶嵌的七块青石板上,“红军烈士纪念馆”的隶体铭文金光闪闪,塔前空坪上铺就一行大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1934年2月2日,“二苏大会”结束的次日,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红军烈士纪念馆等革命纪念建筑的揭幕典礼。

# 宜昌:全力推进“两线”范围矢量化

湖北省宜昌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75处、宜昌市文物保护单位126处。2021年11月,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划定公布了“市保”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22年底,宜昌市已全部完成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两线”范围空间信息采集工作,并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管控和保护;2023年底,当阳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等地均已完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空间数据采集工作。

## 提高站位,主动作为

在开展空间信息采集工作之前,宜昌市只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村组地址和GPS坐标,暂无全市文物矢量数据,既不利于项目设计单位初选阶段避让文物,也不利于文物部门进行“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审批,成为高效开展行政审批工作的堵点。

如何既高效服务项目建设,又有效保护不可移动文物?2021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就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出指导意见;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通知》,就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提出具体要求。为进一步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11月,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启动实施“宜昌市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空间数据采集”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全市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两线”范围进行矢量数据采集。

## 精心组织,确保质量

为扎实做好空间数据采集工作,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此项工作,并明确专人负责,各地均选派业务能力强、工作负责同志参与其中。项目实施前,一方面与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充分沟通对接,确定采集的数据为Shapefile和CAD格式,确保数据格式符合“一张图”要求;另一方面广泛听取工程项目设计单位的意见,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确保采集的数据服务对象能用、好用。在项目实施中,由空间数据采集单位和各县市区文物部门共同派人组成工作队开展田野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密切合作。同时,组建了专门的微信工作群,及时沟通数据采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项目完成后,各县市区主动对接同级国土规划部门,将所有采集的

空间数据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目前,空间数据采集成果已高效服务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审批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 认真总结,服务“四普”

此次田野工作实际采集了219处不可移动文物空间数据,拍摄文物现状照片数据达10G。田野工作完成后,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编制完成《宜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数据采集成果图册》,留作资料存档备用。该项目的实施,达到了工作预期,锻炼了基层队伍,特别是很多刚入职的年轻同志亲身参加田野工作,对辖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情况更加熟悉。在图册编辑过程中,各县市区对辖区内不可移动文物情况认真梳理,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为“四普”打下坚实基础。同时,针对此次采集工作中存在的部分县市区对于“两线”范围估计过小,致使航拍的正射影像图范围不够;部分遗址散布于多个乡镇山区,田野工作耗时较长,在线路安排上有待优化等不足,宜昌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将认真汲取此次工作经验,取长补短,确保全市“四普”工作按时高效完成。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供稿)



杨家河兵寨群之白马寨



长阳县采集人员对田野文物开展测绘